

论梁启超对近代朝鲜文学的影响

李亚洲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梁启超是清朝末期及民国青年的杰出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改革家，他不仅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日占时期的近代朝鲜的思想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梁启超对近代朝鲜部分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文学主题所产生的影响，旨在突出梁启超思想对朝鲜近代文学史中的关键作用，为进一步比较研究东北亚近代文化交流和文学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研究路径。

关键词：梁启超；近代朝鲜文学；新民；文学救国

前言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具备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面貌，还广泛传播至东亚其他国家，尤其是近代朝鲜的文学界。新民思想是梁启超启蒙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当时朝鲜半岛爱国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若要克服国家和民族所处的危机，首先需要振作国民的精神和心态。^[1]梁启超的《新民说》伴随着《新民丛报》和《饮冰室文集》恰逢其时地传入朝鲜半岛，被爱国启蒙思想家们广泛传阅并引起共鸣。特别是在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中国第一本小说专门刊物《新小说》^[2]时，他在发刊词《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概念。随着梁启超的众多著作在开化期大量地被介绍到朝鲜，他的社会实用主义文学观也对韩国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于在近代朝鲜的开化期，尚难找到明确建立的独立小说理论，因此，梁启超的实用小说理论无疑对近代朝鲜开化期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在当时，以小说的价值论为基础的“积极效用论”已经逐步形成。^[3]由于梁启超的历史传记小说本身就体现了他的小说理论，因此，与梁启超作品直接相关的韩国开化期小说理论也展现了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

1 申采浩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深化

申采浩（1880-1936）是近代朝鲜的重要历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其历史创作深受梁启超小说革命思想的启发，尤其是如何通过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达到启示民族觉醒和唤起民族责任感的目的。

申采浩是接受梁启超新民思想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他提出了新国民说，指出为了在竞争时代胜出，首先必

须培养新国民的力量。在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影响下，他于1910年2月22日至3月3日在《大韩每日申报》连载了题为《20世纪新国民》^[4]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申采浩强调国家思想的核心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在社会进化论的压倒性影响下，将生存竞争视为国际政治的运行原理，将贯彻强权合理化，体现出申采浩受到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但申采浩并未止步于模仿梁启超自强的国家思想和历史观，而是应对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差异，始终支持立宪共和制，同时在1920年以后，在武力斗争论和无政府主义之间摇摆徘徊，并竭力寻求思想的独创性。申采浩强调各个阶层的国民都应具备对外的竞争意识和奋发图强的意志，若要在生存竞争的世界上存活下来，就必须成为“新国民”。不难看出，申采浩的这种思想主张与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的主张一脉相承。尤其是关于国家竞争和启蒙国民（新民）紧迫性的认识方面，几乎完全一致。

申采浩强调小说的效用法则，并与梁启超的思想相接轨。梁启超认为小说具有通俗性，与严肃、僵硬、死板的知识学问不同，能够引起人类普遍的共鸣。因此，为了将全体国民打造成为新国民和爱国者，应该将小说视为教育国民的重要手段。^[5]在申采浩看来，小说通俗而巧妙，与僵化而严肃的学术知识不同，它能够形成普遍的共鸣。因此，申采浩主张：为了将全国人民培养成新国民和爱国者，小说在教育大众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申采浩在其关于文学的论述中提到了《国汉文的轻重》、《近今国文小说作者的注意》、《小说家的趋势》、《文艺界青年请参考》等文章。^[6]在这些文章中，他对传统小说和新小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展现了他的“效用论”文学观。申采浩通过上述文章批判了当时小说的低俗性和淫秽性，并在民族危机的紧迫背景下，强调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美学作为文学的核心。

作者简介：李亚洲（1999年生），男，回族，河南省新乡市人，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学生，研究方向：朝鲜语笔译。

总体来看,梁启超与申采浩的生平在四个方面展现出极大的相似性。首先,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相似,都正值外来势力侵略并使得原有的民族共同体逐步瓦解的时期。其次,作为本可无心政治的文学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安于现状的生活方式,投身于符合时代救国主题的生活道路。第三,他们的救国运动主要通过媒体、著述、文学、教育活动等方式展开:梁启超和康有为发起戊戌变法,而申采浩则领导秘密组织^[7],二人皆采取了积极的斗争手段。第四,他们的救国斗争经历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海外流亡紧密相连。梁启超的思想通过其著述对申采浩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开展爱国启蒙运动时。梁启超则强调政治小说的翻译、白话小说的创作,以及伟人传记的翻译与撰写的重要性;申采浩完全接受了梁启超对小说作用的看法。

2 朴殷植与梁启超旧小说批判的契合

朴殷植,男,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儒学家、教育家、新闻工作者、独立运动家。在近代朝鲜开化期,受梁启超小说论影响的知识分子中,朴殷植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人物。尹世复在谈及朴殷植(1859-1925)的活动时曾评价其“处于新旧交替时代,具备丰富的阅历经验。”^[8]可以看出朴殷植在新旧更替的时代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在文学领域,这一评价同样适用:朴殷植在坚守汉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提出了小说作为新时代国语文学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新旧文学观的更替”。1906年,大韩自强会成立后,他积极参与活动并在《大韩自强会月报》上发表了大量爱国启蒙的文章,如《大韩精神》、《能否自强之问答》等。自1905年《乙巳条约》^[9]被强制签订后,朴殷植撰写了大量论说,倡导通过新式教育实现救国,提出实业救国思想、社会习俗改革思想、爱国思想、大同思想等爱国启蒙理念,并积极展开爱国启蒙运动。

朴殷植的文学论在韩国文学史上受到关注的原因,与其文学论本身的内容相比,更在于其文学史上的地位。《瑞士建国之序》(1907)中提出的“文学效用论”成为朴殷植文学观的代表性观点,这篇文章是朴殷植于1907年翻译郑贯公的《瑞士建国志》^[10]时所撰的序言。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他对韩国开化期流行的小说提出批判,同时也指责传统中国小说为“海淫海盗”^[11],这一逻辑与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批判观点——海盗海淫极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朴殷植在中国从事独立运动期间,还曾在1914年前往香港,并受中国友人邀请,担任中文杂志《香江》的主编,又在上海撰写了《安重根传》和《韩国痛史》^[12]等著作。在此期间,他与中国的爱国启蒙思想家康有为、

梁启超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朴殷植与梁启超的直接交往始于1914年,但他早年已阅读并喜爱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及《饮冰室文集》。此外,他还翻译或改写了梁启超的《爱国论》《论师范》《论幼学》等文章,并在韩国开化期的报刊上发表。朴殷植认为小说“匹夫匹妇之菽粟茶饭”^[13]之说,与梁启超的“小说之在人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一脉相承。此外,他认为小说“皆荒唐无稽且淫靡,对政教与世道之危害不浅”^[14],这一观点也与梁启超所批判的“海盗海淫”相类似。

3 安国善对梁启超寓言小说讽刺性的继承

安国善(1878-1926),近代朝鲜时期的作家、小说家。随着韩国开化期文学与正论性话语的结合,小说不再仅仅是闲聊或娱乐的领域,而是开始承担起社会角色。这一时期的小说通过讽刺和幽默的手法描绘现实,或采用寓言和梦游录等技巧进行文学表现。

对近代朝鲜发行的辩论体小说影响最大的作品无疑是梁启超的《自由书·动物谈》。这部作品采用了寓言小说的形式,通过描写动物的行为来揭露人性的不道德和阴暗面。内容主要为:作者躺在旁边房间,听到甲、乙、丙、丁四个动物的交谈,他们正在讨论一个动物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四种不同的动物来比喻腐败和衰落的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尖锐地讽刺了当时中国的现实社会。这四种动物的困境正是从四个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危机。梁启超通过动物寓言的形式来反映现实,受到众多读者追捧,这部作品也于1907年在《书屋》第3期文苑栏发表,次年又作为小说刊载于《大韩协会报》第1期,得到了极大的反响。《禽兽会议录》是安国善^[15]的代表作,这部寓言小说兼具议论体小说的特点,以动物为角色,对人类社会进行讽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安国善创作此书直接受到《动物谈》的影响,但两部作品在构思和结构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部作品都采用了“叙述者在梦境中听取动物谈话”的开端设定,并以“听完故事后反思”作为结尾。然而,除了《禽兽会议录》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侧重于人类伦理问题外,其余部分与《动物谈》的内容比较相似。表面上看,《禽兽会议录》讨论的问题似乎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议题,但实际上,它探讨的核心仍然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问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安国善在创作《禽兽会议录》时,借鉴了梁启超的笔名“饮冰室主人”这一称号,并自称为“农宫室主人”,这一点也暗示了他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与《动物谈》中由四个角色通过对话来讲述动物故事的方式不同,《禽兽

会议录》直接通过动物的登场和演绎,产生了由此引发的幽默感,这种幽默与批判性结合,使得其刻意的讽刺性更加鲜明。安国善曾在文章《爱国精神》^[16]中提出的“民气”和“民力”的发展、“独立自由”的思想、“自强”的思想以及“弱肉强食”思想和梁启超的《动物谈》所体现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此外,梁启超曾在《国民十大元气论》^[17]将“元气”定义为国人的精神,认为个人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都取决于元气的有无:如果没有元气,人就会依赖他人的力量,从而沦为奴隶;国家则会向强国寻求保护,最终成为殖民地,无法维持独立。同样的,安国善曾在《民元论》^[18]中对朝鲜元气的衰退表示哀叹,认为而国民则必须在国家主权得以确立的前提下才能生存,元气的衰弱是国家丧失主权的征兆,因此必须加以振作。从上述比较来看,梁启超与安国善都对民众元气上的松懈发出了警告,并在政治层面上进行了强调,这一点具有共通性。

结语

如前文所述,在近代朝鲜的开化期,梁启超等中国近代思想家对韩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与西方或日本思想家的影响同样重要。朝鲜开化期的知识分子在翻译和介绍梁启超著作的历程中,一直围绕着“爱国”与“启蒙”这两个核心主题展开。所以,梁启超思想的传入,对近代朝鲜开化期文学理论的确立于近代文学的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并不完全意味着韩国开化期文学受到梁启超的影响。这里所说的“贡献”,是指梁启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朝鲜文学的发展,尤其在爱国启蒙文学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这种爱国启蒙文学在韩国近代文学史上,应当被认识到其实际具有比以往认知更大的影响力和规模。

参考文献

- [1]张乃禹:《异质与同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 [2]《新小说》是梁启超在1902年于日本横滨创立的一份期刊。这是中国近现代第一份专门以登载小说为主的杂志。
- [3]이재선,『한국개화기소설연구』,일조각,1992,p153.

[4]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首尔:萤雪出版社,1977,p228-229

[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

[6]《國漢文의 輕重》,《大韩每日申报》,1908;《近今國文小說著者の 注意》,《大韩每日申报》,1908;《小説家の趨勢》,大韩每日申报,1909;《文藝界青年에게 參考를 구함》,《東亞日報》,1925

[7]1907年,申采浩参加了安昌浩等人创立的地下组织新民会,并起草了《大韩新民会旨书》。1909年,他与尹致昊、安昌浩和崔南善等人组织起“青年学友会”,并执笔起草了“会旨”,成为独立运动的先锋。

[8]尹世复,「몽배금태조서」,『백암박은식전집』4,동방미디어,2002,p42.

[9]《乙巳条约》,日本帝国与大韩帝国在1905年(按干支纪年为乙巳年),条约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日本根据该条约设置韩国统监府以控制韩国,标志着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变成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

[10]郑贯公受日本阅读席勒剧本的《威廉·退尔》影响,于1902年创作了此作品。

[11]梁启超:“誨盜誨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風氣,魚爛於此間而莫或知。”,《译印政治小说续》,《饮冰室文集》,第三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

[12]朴殷植:《韩国通史》,上海:大同编译局,1915

[13]朴殷植:「瑞士建國誌」,『歷史傳記小說』第6期,아세아문화사,1979,p195.

[14]朴殷植:《朴殷植全书》(下),首尔: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中心,1992

[15]安国善曾于1894-1898年在日本东京留学,1898年《清议报》创刊,梁启超发表的《戊戌政变记》和《译印政治小说序》,安国善极有可能接触过梁启超的作品并受到其提出的“小说效用论”的影响。

[16]安国善:『애국정신』,《乙酉文學史》,1981

[17]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清议报》第33期,1899

[18]安国善:「民元論」,『夜雷』第2期,1907,p15.